

从标准语规范化到语言管理理论

——布拉格学派与语言规划

王英杰^{1,2}

(1. 山东财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济南 25001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文章主要阐述布拉格学派在语言规划方面的实践与研究以及最新的理论发展——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布拉格学派积极参与了捷克标准语规范化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并提出了“语言培养”(Language Cultivation)的概念,对现代语言规划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语言规划研究从宏观走向微观,布拉格学派提出了语言管理理论,将语言管理分为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简单管理仅对个人交际行为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管理,组织性管理则是基于个人交际之上,涉及多个交际情境,往往由相关机构参与的语言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管理是一个过程,包括偏离规范、注意、评价、选择调整方案和实施调整方案等不同阶段。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标准语规范化;语言规划;语言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H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634(2014)06-0100-07

From Norm Standardization to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Prague School and Language Planning

WANG Ying-jie^{1,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language planning practice of Prague School and its latest theory development, i. e.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LMT). Prague School engages in the norm standardization of Czech language as well as relevant research,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Language Cultivation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odern language planning theories. With the shift of the focus of language planning from macro to micro aspects, Prague School has developed LMT. According to LMT, language management is performed at two levels: simple management and organized management. Speakers can manage individual features or aspects of their own or of their interlocutor's discourse in a particular interaction, which is simple management; organized management based on simple management is trans-situational and more or less institutional. Besides, the language management is a process which contains standard deviation, noting, evaluation, adjustment, implement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Prague School; norm standardization;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LMT)

收稿日期:2014-05-16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WYC051)

作者简介:王英杰(1978—),男,山东莱州人,讲师,博士生。

布拉格学派始建于1926年10月6日布拉格语言学会召开的首次会议,该学派人才济济、理论纷出,代表人物有马泰休斯、特鲁别茨柯依、雅各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克、马丁内。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布拉格学派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学派,对现代语言学发展影响深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布拉格学派最活跃、最有影响的时期,布拉格语言学会成果频出。1952年该学会宣告解散,但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仍在继续,五十年代之后,新布拉格学派秉承了前辈的传统与原则,对语言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从上个世纪末,捷克查尔斯大学涌现出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和语言规划研究者,他们作为新一代的布拉格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布拉格学派的原则、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崭新的语言规划理论——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①台湾学者林蒨慧将其翻译为“语言处理”和“语言处理理论”^[1];周庆生的译文是“语言治理”和“语言治理理论”^[2]。;研究者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2008年)、日本早稻田大学(2011年)和捷克查尔斯大学(2013年)先后召开了三届国际研讨会,出版了论文专辑《接触情境中的语言管理:欧洲、亚洲、大洋洲的视角》(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s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3]。国内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布拉格学派在语言系统与功能、音位学、区别性特征、功能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却往往忽视其在语言规划实践与理论方面的诸多建树。本文主要阐述布拉格学派在语言规划方面的实践与研究以及最近的理论发展——语言管理理论。

一、布拉格学派与标准语规范化

依据语言是开放、动态的符号系统这一概念,布拉格学派提出标准语言的语体划分原则。马泰休斯认为对标准语言的语体分析体现了语言的“灵活稳定性”(elastic stability)，“灵活”体现了语言的动态特点，“稳定性”反映了语言的系统性。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标准语言确实代表了一种稳定的规范,不仅保证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确保有共同的美学标准;而另一方面,又需要不同语体来满足社会成员在不同交际场合的交际需求。关于标准语言的概念,布拉格学派比英美语言学家早提出二十多年^[4]。

标准语规范化是指从原有的各种非标准语言(或方言)中选取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对该语言系统进行规范的过程。标准捷克语是19世纪中叶民族复兴运动的产物。1918年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独立,捷克语被确立为官方语言,通俗捷克语一方面迅速普及,一方面其相对保守的规范语规则和生活化的口语习惯产生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布拉格语言学派在三十年代引入了规范捷克口语的新概念,把规范的口语同书面语区分开来。

在实践方面,布拉格学派积极参与了捷克标准语的规范化工作,如词典编纂和举办语言讲座等。1932年布拉格学派中的语言学家开办了一个广播讲座系列,探讨“标准捷克语与优美语言的培养”。后来,讲座由哈兰尼柯(Bohuslav Havránek)和维恩加特(Milosa Weingart)用与讲座同样的名称编辑出版,收录论文包括马泰休斯《对标准语稳定性的要求》,哈兰尼柯《标准语的任务和培养》,雅柯布森《今日捷克的语言纯正主义》,穆卡洛夫斯基《标准语和诗歌语》,维恩加特《捷语正音学》和《培养良好语言的一般原则》。总的来说,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标准化应当与日常语言运用相结合,标准语言只能体现在文学和其他公共文献中,因此,语言标准化的成功有赖于普通大众明确什么是良好语言并在社会交际中使用。布拉格学派对规范化理论的研究还包括如何判断标准语形式,语言学理论对建立标准语可能做出贡献的领域,等等。除了理论建树,布拉格学派还对捷克语标准化的具体实施提出了建议,认为应该先出版一些具体的用法指南手册,指导人们的语言实践,而不要把语言标准化建立在简单的统计基础上,认为只有在全体语言实践者都认可才可以推行标准化。

早在1932年,维恩加特在“培养良好语言的一般原则”一文中提出了培养(Cultivation)这一概念。1935年,哈兰尼柯等人在布拉格语言学会机关刊物《词与文》(Slovo a slovesnost)的发刊词上,把“语言培养”(Language Cultivation)作为该刊物的主要目标,指出语言培养应涵盖语言政策、语言教学、语言

^① 本文将 Language management 和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翻译为“语言管理”和“语言管理理论”。

加工三个方面。布拉格学派的 Neustupný 将 Haugen^[5] 所提出的第四个阶段^①变为第三个阶段,然后将“语言培养”作为第四个阶段,强调语言规划的长期性和过程化^[6]。正因为此,布拉格学派的理论被认为仍具有现实意义^[7]。值得一提的是,布拉格学派不仅重视相当于本体规划的语言培养,而且重视交际过程培养,即语言使用的培养^[8]。

此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社会与各学科的发展进步,各种术语日益增加,布拉格学派开始关注术语的研究,他们既重视对术语的特点、术语与一般词汇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十分重视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工作,并且推动政府颁布了 500 多项专业术语标准。布拉格学派的语言规范理论对语言管理理论创立者之一、当代布拉格学派代表学者 Neustupný 影响很大。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Neustupný 即开始语言规划的研究。随后,很多学者与 Neustupný 一起将布拉格学派提出的语言规范理论及相关观点引入到语言管理的研究中^[9]。

二、布拉格学派与语言规划理论的发展趋势——从宏观到微观

Tollefson(2002: 425)曾预测未来语言规划从宏观向微观问题转向,可与交际民族志、微观社会语言学等理论联系起来^[10]。Jernudd 强调交际是人的话语过程,语言规划应以此为前提,应重视话语和参与话语中的人,研究重心不应局限在宏观层次的地位规划,而是应该放在现实话语中的语言问题上^[11]。

随着语言规划研究的发展,为了弥补“自上而下”的语言规划的不足,语言规划研究领域逐渐从“规划型”转变为“管理型”,研究重点从“自上而下”转移为“自下而上”的语言管理。Mühlhäusler (1996: 311—312)认为,直到 20 世纪八十年代语言规划的前提还是将语言多样性视为问题,解决此问题只能通过精简和中央计划^[12]。新一代布拉格学派的代表人物 Jernudd 与 Neustupný^[13]、Nekvapil^[14]认为“语言规划”一词应该专属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引入“语言管理”这个新术语,专指语言规划发展的新阶段。语言管理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和社区交际的语言管理方法,而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管理方法,由政府或权威机构实施。Jernudd(2009: 251)认为现代国家语言规划、标准化,排斥变异,而后现代国家则认可变异^[11]。语言管理学派是“从学术上对人民权力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反对“规划”派的强制性举措,反对语言上的净化主义(purist ideology),“认可多元的利益诉求”^[15]。

三、布拉格学派与语言管理理论

语言管理理论是在语言规划从宏观走向微观这一学术背景下,指由新一代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 Jernudd 与 Neustupný (1986)、Jernudd(1991)、Neustupný (2002)、Nekvapil (2006)等逐渐发展而成的语言规划理论。语言管理理论将宏观的语言规划基于语言问题之上,具体的语言交际被视作语言问题的主要来源,将语言规划的理论重心从宏观维度转移到了微观维度,即从国家、组织层面转移到个人语言交际的维度。语言管理过程的理想模式是:识别、确定个人会话交际中的问题→具体的语言规划机构采取具体的语言措施→在个人会话交际中执行这些措施。

Neustupný(1994: 50)明确指出语言规划应该考虑出现在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只有解决会话中的这些问题,语言规划的过程才是完整的^[16]。语言管理理论是基于语言使用的两个过程:第一,话语的产生和接受;第二,针对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语言活动(与 Fishman(1972)提出的“针对语言的行为(behavior-to-language)”^[17]一致),后者被称作语言管理。如在会话过程中针对某个很难辨别的单词发音(上述过程一),微观层次上,说话者对话时会小心翼翼地重复,免得听话者听不懂;而在宏观层次上,学术机构会将该音标准化并由政府部门批准(上述过程二)。Jernudd(2009: 245)认为语言管理理论就是系统、明确地研究交际过程中个人的表达(话语的产生与接受)与对表达的注意(noticing)和评价(evaluation)

^① 美国语言规划专家 Haugen(1966)曾将语言规划分为四个阶段:标准的选择(Norm Selection)、标准的制定(Norm Codification)、标准的实施(Norm Implementation)和标准的扩建(Norm Elaboration)。

结果(元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这些元语言活动可能在交际过程中即时发生,也可能稍后发生^[11]。

1. 语言管理理论与微观-宏观概念

语言管理不仅出现在覆盖整个社会活动的各种国家机构中,而且出现在公司、学校、媒体、协会、家庭和交际中的个人中。因此,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关注宏观社会层面,而且关注微观社会层面。

语言规划主要侧重于研究宏观层次的由国家或机构层面进行的语言规划活动。而随着西方国家功能的削减,社会的逐渐分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微观层次的语言规划逐步引起关注^[18]。从语言管理理论创立之始,就强调涵盖宏观(国家)和微观(个人)层次两个维度的语言规划,认为国家语言规划者和研究者应该平衡使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也有学者认为在宏观和微观之间存在连续体和中观层次。Nekvapil(2006)从社会学引入社会交际(微观)和社会结构(宏观)两个概念,认为社会交际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辩证的关系^[14]。正如 Giddens(1993:165)所说,社会结构既是社会交际产生的条件又是社会交际产生的结果^[19]。在语言管理理论的框架下,微观层次的语言规划(简单管理)与宏观层次的语言规划(组织性管理)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相互产生作用。

2. 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区分简单管理(simple management)和组织性管理(organized management)。简单管理是管理出现在个人交际活动中的问题^[20]。如电视采访中的主持人使用了某个口语表达之后,马上说出相对应的标准表达(会话分析理论称之为自我修复 self-repair)。除了简单管理之外,语言管理理论包括更复杂的管理过程,即涉及多情境的、有时带有某种或强或弱的机构性特征,语言管理理论将其称作“组织性管理”^[21]。

简单管理逐步过渡到组织性管理。如在家庭中,语言管理通常是简单的个人话语修复,但在多语或双语社区的家庭中,当父母讨论决定是否用某种表达或语言变体时,往往与意识形态有关,这就属于组织性管理。而语言改革是更高层次的组织性管理。语言管理理论认为语言问题的解决始于简单管理,再从简单管理过渡至组织性管理,组织性管理的终极目标也是解决个人语言问题,Neustupný(1994)认为应尽可能地将组织性管理建立在简单管理之上^[16]。

3. 语言管理的过程

语言管理理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层级程序性(processuality),即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具有很多层级阶段。以简单管理为例,简单管理不仅仅局限于“纠正”这一阶段,当说话人注意到(note)某些语言偏离规范时,管理已经开始,也就是说语言管理始于偏离规范的语言。在注意之后——评估(evaluate)注意到的偏离。这一阶段是语言管理理论的关键,因为在该阶段,说话者将语言问题视为偏离规范并给予负面评价。然而,说话者也有可能正面评价规范偏离。在评价之后,下一阶段可能进行的是调整设计,最终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用下例说明管理过程的一系列过程(M是德国—捷克跨国公司的经理,S是关注该公司交际情境的研究者),该例及分析取自 Nekvapil 与 sherman^[22],例1:

- a. M:——谈到工作室,在人事范围内
- b. 99%情况下工作室中没有德国人
- c. 没有专家
- d. S: 嗯
- e. M:(我)喜欢说话时用德国人这个字眼,所以,嗯——

从这个片段中可以看出,M使用了“德国人”这个涉及民族范畴的字眼(第2行),但在短暂沉默后,他用“专家”替换了“德国人”(第3行)。该公司的语言规范是不能使用民族范畴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会使人联想到捷克人与德国人共同经历痛苦历史。因此,语言管理过程是,M注意到自己偏离了规范,明显给予这个偏离以负面评价(在第5行中清楚看出),调整设计(即找到同义的非民族范畴的词)并执行,即使用“专家”这个词来表达。组织性管理也可以区分注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注意(noticing)是基于对简单管理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这个阶段之后是对该语言环境评价、语言政策调整、付诸实施。

4. 语言管理循环(cycle)

语言管理理论的特点之一是关注简单和组织性管理间的互动。简单说,组织性管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说话者在日常交际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语言、交际、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自己无法解决,他们会依靠社会机构中的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这些语言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a. 在具体交际场景或活动中可以直接解决的问题(如前述例1中的第2行、第3行);

b. 在具体交际活动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但说话人自己可以在交际后解决(如通过查阅词典、咨询朋友等途径);

c. 无论是在具体交际中还是在交际后,说话人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Neustupný认为任何语言规划都应始于出现在话语中的语言问题,直到问题消除,规划的过程才算终结^[16]。

如果在具体交际中产生的问题是微观问题,在其他社会机构中产生的是宏观问题,语言管理循环可以简单地描述为:

微观→宏观→微观

这个框架准确描述了以下典型的情境: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关注;问题解决后,调整方案又为大众所接受。其中,微观→宏观→微观更有可能出现在本体规划中,而宏观→微观更易在地位规划中出现。

当然,这个情境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中或在逻辑上仍存在“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和“语言管理循环片段”: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类型1

微观→宏观

使用语言的大众所产生的问题,引起语言专家或其他专家的关注,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或者大众并不接受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

不完整的语言管理循环:类型2

宏观→微观

专家设计的调整方案没有考虑到大众的实际语言问题,却执行了该调整方案。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类型1

仅在微观层次(大众产生的语言问题只通过进行中的交际加以解决或通过交际前后的管理解决)。

语言管理循环片段:类型2

仅在宏观层次(如语言规划机构不关注大众所产生的语言问题)。

实际上,简单管理和组织性管理都很复杂,上面提出的框架并不能完全涵盖。例如,个人对语言问题的认识是变化的,换言之,个人可能总是负面评价规范的偏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以给予中性评价,甚至正面评价。组织性管理需要关注不同的机构管理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问题的方式和这些管理行为是如何关联的。

5. 语言管理理论研究方法论

组织性管理层次上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基于简单管理的分析之上,这是语言管理理论方法论上的关键要求。因此,分析个人交际的研究方法是语言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可以作为分析和阐释研究资料的诊断性工具,而且还可以直接运用于研究过程中。也就是说,语言管理过程模式可以作为半结构式访谈中提问的向导,第一部分问题与语言使用有关,第二部分与语言管理相关,即与评价和调整有关。与语言管理有关的问题可以询问会话者语言环境是否适合,他是否想要改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如何改变。研究者也可以让会话者分别回忆有语言问题和无语言问题出现的语言环境,并且询问其个人经历,使研究者能够将会话者的语言使用、语言管理与其个人经历联系起来。

语言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性管理必须基于简单管理之上,该理论发展了基于民族志研究的会话分析方法,尤其是会话修正的分析。不仅如此,语言管理理论也关注会话者的心理层面。因此,语言管理理

论除了要准确记录自然发生的会话交际的声像资料、进行会话转录和分析之外,更要进行随后的访谈(follow-up interview)。在访谈中,研究者让会话参与者回忆简单管理,如听一段录音片段后,研究者询问讲话者对使用的某个单词是否进行了评价、如何进行评价。在组织性管理层次,同样可以划分为注意、评价、计划调整、执行四个阶段,即基于各个层次语言环境的调查研究、语言环境的评价、语言政策的调整、付诸实施。

四、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中的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管理

语言管理理论不仅关注语言现象,而且同样关注交际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

Heller(2001: 225)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裔少数民族学校(该校所在城市的通用语言为英语)进行民族志研究,分析了一段师生对话,例2:

a. 教师: pourquoi lit-on ? [why do we read ?]

b. 学生: pour relaxer [to relax]

c. 教师: pour se détendre, 'relaxer' c'est anglais [to 'se détendre' (relax), 'relax' is English]

在第3行出现了语言管理。教师注意到学生在法语对话中用了一个英文单词,他给予了负面评价,并进行了调整。这段对话显示尽管教师和学生都具备英-法双语能力,却遇到交际管理的问题,因为学校规定法语是课堂交际语言。在这段对话中,同样存在社会文化管理因素——由于该校接受操法语者的政治和经济资助,教师更愿意“做一个讲好法语的安大略人”。

就组织性管理而言, Neustupný 和 Nekvapil(2003)认为成功的语言管理取决于成功的交际管理,而成功的交际管理又取决于成功的社会经济管理。因此,语言管理必须在社会经济和交际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如要去除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形式(语言管理),其前提得是确保不在交际中使用这些语言形式(交际管理),而要真正从交际中去除这些语言形式须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保证性别平等(社会经济管理)。根据语言管理理论,管理的顺序应该是:社会经济管理>交际管理>语言管理。

五、结束语

布拉格学派不仅是继索绪尔语言学说之后欧洲最重要的语言学流派之一,而且西方后来出现的一些语言学流派包括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受到布拉格学派的影响,正如美国语言学家 Dwight Bolingers 所说:“欧洲人和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学派那样的巨大影响。布拉格学派成员从来没有企图规定语言学范围,他们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产生形式演绎系统,但他们提出了一套原则。这些原则,既为该会员普遍接受,也在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纳。”^[23]。

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侧重于从功能入手研究语言形式,常被称作是功能主义者或功能语法学派。无论是标准语规范化还是语言管理理论都秉承布拉格学派功能主义传统,强调研究真实语境下的交际话语,从语言交际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标准语规范化强调语言标准化应当与日常语言运用相结合,既重视相当于本体规划的语言培养,又重视交际过程培养,即语言使用的培养。语言管理理论着眼于微观层面个人或社区的语言问题,重点研究日常会话中的语言问题,因此许多研究者将其运用到接触情境(contact situations)研究中。而且,语言管理理论确立的语言问题的范围远远超过语言规划所涉及的问题(从语音、音位、形态,到语言教学),并且在语言管理理论框架下,语言问题的解决与交际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相关,如某种语言变体的使用领域不仅取决于语言、文化、态度等因素,更多的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因素。

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的开放性和层次性,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绝对统一、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不完全平衡的系统,由许多互相依存的次系统构成。标准语规范化既关注语言的“稳定性”即语言的系统性,又关注语言的“灵活性”,即语言的动态特征,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世界,需要不断地打破自己的平衡,去适应客观世界,才能满足交际功能的需要,这一点突出表现在词汇方

面,新词汇的出现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变革。在此指导思想下,布拉格学派在术语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而语言管理理论继承了层次性的观点,主张从各个层次研究语言问题:在微观层次,如个人、家庭、小型社会网络;在中观层次,文化和职业社团、经济组织、媒体、教育机构、地方政府;宏观层次,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因此,语言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围覆盖语言体系的各个层次和语言使用的各领域。

总之,布拉格学派提出的一系列原则、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语言本体研究方面,还体现在语言规划领域。语言管理理论作为布拉格学派对于语言规划的最新贡献,继承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传统以及语言系统性与层次性的论断,注重从实际语言生活产生的语言问题着手,从微观、中观、宏观层次研究语言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将推动语言规划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 [1] 林蒨慧. 從捷克境內的德語社群? 語言認同問題[J].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 2005, (2): 211—228.
- [2] 周庆生. 国外语言规划理论流派和思想[J]. 世界民族, 2005, (4): 53—63.
- [3] Nekvapil J, Sherman T.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M].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 [4]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5] Haugen 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C]//In W. Bright (ed.). Socio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1966.
- [6] Neustupný J. Basic types of treatment of language problems [J].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1970, (1): 77—98.
- [7] Garvin P L. Some comments on language planning [C]// In J. Robin and R. Shuy (eds.). Language Planning,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4—33.
- [8] Nekvapil J. Language cultivation in developed contexts [C]// In B. Spolsky & F. Hult (eds.). The Handbook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Malden, MA: Wiley Blackwell, 2010: 251—265.
- [9] Nekvapil J, Sherman T. Introductory remarks [C]//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i—ix.
- [10] Tollefson J W. Limitations of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C]//In R. B. Kapl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24—425.
- [11] Jernudd B. An apology for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C]//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245—252.
- [12] Mühlhäusler P. Linguistic Ec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 [13] Jernudd B, Neustupný J. Language Planning: for Whom [C]// Paper at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Language Planning. Ottawa, May 1986.
- [14] Nekvapil J. From language planning to language management [J]. Sociolinguistica, 2006, (20): 92—104.
- [15] Jernudd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An interpretation of findings [C]//In E. H. Jahr (ed.). Language Conflict and Language Planning.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3: 133—142.
- [16] Neustupný J. Problems of English contact discourse and language planning [C]// In T. Kandiah & J. Kwan—Terry (eds.). English and Language Planning. Singapore: Academic Press, 1994: 50—69.
- [17] Fishman J A.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 to Language in Society [M]. Rowley: Newbury House, 1972.
- [18] Kaplan R B, Baldauf R B.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7.
- [19] Giddens A.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M].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 [20] Neustupný J. Language management in the Czech Republic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3, (4): 181—366.
- [21] Nekvapil J. The integrative potential of 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 [C]//In J. Nekvapil & T. Sherman (eds.). Language Management in Contac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Peter Lang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 [22] Nekvapil J, Sherman T. Pre—interaction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entral Europe [J]. Current Issue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9, (2): 181—198.
- [23] (美)Dwight Bolinger. 语言要略 [M]. 方立, 李谷城,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蒋涛涌)